

美麗的福爾摩沙—創意之島

林濁水

立法委員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跨領域結合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如電影或電視連續劇，這幾年競爭力大幅衰退，大幅落後韓國，甚至中國也漸漸掠奪電視台的市場。有線電視開放後，許多電視台競相製作新聞節目，且於一般晚間的黃金時段製播政治性Call In節目，因此並沒有在文化藝術創意議題上多加關注。由政治人物來談論文化創意產業議題是跨領域的結合，但或許現今文化藝術便已是跨領域的結合，不同於以往純藝術類型，如舞蹈、戲劇、音樂、美術、雕塑、平面繪畫般的壁壘分明。如著名作家高行健不久前演出的〈八月雪〉，就是一齣結合繪畫、裝飾、舞台佈置、歌劇、當代舞蹈、音樂與京戲的一齣戲劇。西方悲劇的表演主題，是把人放在一個非常極端的處境，從人跟神的對質、道德與道德的對

抗，最後戲劇衝突到最高點的時候，就以無解的命運做結論。在無解的悲劇中，就悲劇理論而言，人對不可知的命運會產生畏懼恐懼的心情，會浮現一種油然而生的敬畏感覺，但人的精神也會同時得到滌清。以希臘悲劇而言，衝突是無解的，但在〈八月雪〉演場中，把戲劇衝突化解成輕鬆一笑，也化解了衝突。

以政治的角度來反省，文化創意產業以往不受到重視。過去十幾年來，台灣的發展是世界奇蹟，從農村社會發展到工商業社會，進一步在高科技產業上更曾躋身世界第三大硬體生產國，目前世界排名則是中國超過台灣，但在資訊、通訊、硬體高科技產業上，中國的產量當中由台灣生產製造的產品仍佔有百分之六十。但在全世界的產值中，軟體的產值早已超越硬體產值，不過台灣仍是以硬體製造為主，而軟體的產值尚不及硬體產值的十分之一。硬體資訊產業，已進入到微化的時代，利潤稀薄，從股票市場便可見其端倪，上市公司股價從數百元跌至數十元，毛利頓然下降。當一產業發展至高峰期時，便要考慮轉型，以免整個產業皆無利可圖。台灣發展過於迅速，當硬體產業發展達到高峰期時，其實下一步就可以考慮發展軟體工業。

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

個人用「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這句話，

來形容台灣現有的文化創意產業，而商業時代雜誌某期主題為平面出版業，則以寒風凜冽來形容出版業。出版業在文化創意產業裡，是個具樞紐性的產業，近來有許多出版社被併購，如商周出版社。而書店的發展，如金石堂書局或誠品書局，在二、三年之前亦是被人看好，但如今卻是辛苦勉強經營。以影音出版業來說，幾年前唱片業興盛一時，由台灣引導了整個華人世界，台灣帶領了大眾流行音樂的風騷。在之前，有才華的歌星欲成名則必須至香港，在被驗明正「聲」認證後，才能在華人世界裡受到肯定。但從大約十年前開始，有才華的歌星卻必須到台灣接受認證，所以現在有許多來自馬來西亞或香港的歌星，紛紛到台灣來接受所謂的認證。但近來影音出版業除滾石唱片勉強支撐外其餘皆被併購，所以這是既光明又黑暗的時代！

再來看電影的發展，以前台灣電影製片顯赫一時，與整體國家文化政策有關，後來逐漸喪失競爭力，但現今台灣電影又別開生面，開創了新途徑，以新電影或藝術電影取勝，如知名導演侯孝賢及楊德昌的電影在國內影展、坎城影展及世界影展闖出名號，似乎藝術電影或新電影又開始慢慢在流行，但原片卻都是由外國人製作的。因此，唱片界和電影界一樣，雖然台灣有頗具才華的製作或後製的能力，也有頗具才華的導演或者藝術家、演唱者，但是產業呈現空洞，已被外資吞併。這種情形與英國稍有類似但又不同，英國以往在人類的文化藝術中表現得相當殊異，主要以文學和表演藝術聞名，但在古典音樂的

領域或是在繪畫上便顯得相對弱勢。不過現在的英國倫敦不僅是在表演藝術範圍，另在視覺藝術上，觀眾佔人口的比例已超過紐約，創新的能力或實驗性能力也僅次於紐約，甚至超越排名在前的柏林和巴黎，使有才華的藝術家得以充份發揮才能。英國具才華的藝術家或導演人才輩出，與台灣是同樣的景象，但導演來自英國，卻是由美國發行成為美國影片。因緣際會下，個人曾得以在國內政府積極推動之文化產業相關研討會上，請教英國藝術行政人員、表演藝術人員、政府文化人員以上問題。英國的代表理直氣壯卻謙虛地回答說，雖然影片發行是好萊塢，但是英國有最好的演藝人員、最好的導演及最好的製作群，因此提供非常多的機會給英國。但個人覺得，如果製作出品者是好萊塢，而工作人員是來自英國，以在商言商的角度來看，英國人做得愈賣力，則英國人的錢便被美國人賺得愈多。雖然導演的酬勞很高，電影明星也是高酬勞，但與影片發行到全世界或單發行到英國那數以千萬的觀眾相較之下，那些高酬勞是微不足道的。換言之，影片製作雖提供許多工作機會，但與影片銷售的對象是以千萬人計而言，工作酬勞則相對低廉，例如優秀的導演雖有高酬勞，但僅導演一個人獲得。因此英國的導演愈優秀，英國人的錢便被美國人賺得愈多，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一個現象！

全球化趨勢的衝擊

前文提及「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何謂最黑暗與最光明？這涉及廣大層面，概括性而言，就是所有的文化創意產業，都面臨了科技發達後的最嚴厲全球化趨勢的衝擊，這衝擊不見得是負面的，有時候是正面的。比如說早期台灣新電影，像前面提到知名導演楊德昌及侯孝賢的電影頗受好評，但在台灣卻不賣座，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票房不錯，楊德昌導演的青梅竹馬票房尚可，其他的影片票房則淒慘無比。但是雖然這些電影在台灣不賣座，卻是賺錢的！這全拜全球化之賜！換句話說，全球化以後，人類資訊消息的傳遞非常迅速，資訊消息的傳遞迅速使台灣藝術電影得以讓懂得看藝術電影的全世界觀眾都知道。所以好的電影如悲情城市，透過非常迅速、便捷的通訊網路，不只台灣觀眾喜歡看，全世界喜歡藝術電影的人都知道這部影片，並都可以觀看。因此在全球化以前，藝術電影的觀眾在全世界每個地方皆是一群小眾，不管是在台灣、美國或是英國皆是小眾而已，但這些小眾在現在全球化的網絡中，凝聚起來則是不算小的大群眾了，所以悲情城市這部影片透過全球化的網絡提供給各地方的小眾觀賞，便有利潤的產生。

因此全球化提供給文化創意產業一個機會，以下的舉例將使我們了解全球化在傳統精緻藝術或通俗的文化活動中，所能帶給我們的機會。以通俗的文化活動來看，跟政府政策最為銜接的是由各地方政府主辦的藝術節，以花蓮與宜蘭為例，兩者

都舉辦得很成功。花蓮是世界第二大石材出口集散地，世界第一大是義大利，第二大石材集散地就是在花蓮。剛開始一些台灣藝術家到花蓮去，提出石雕藝術節的構想，獲得政府部門及文化行政單位同意後，便由藝術家們主辦了石雕藝術節，結果第一次就辦得相當成功！成功的關鍵有下列幾點，第一點是具有國際性，邀請世界著名石雕家到花蓮交流。第二點是在地文化的參與，因為花蓮石雕藝術節與當地特有石材產業銜接，所以當地的民眾有一定的參與程度與熱心。第三點是形成觀光焦點，花蓮石雕藝術節成為觀光活動項目。二〇〇一年花蓮石雕藝術節吸引了大概十萬人次的觀光客，與全花蓮市人口相當。而宜蘭所舉辦的童玩節與花蓮的石雕藝術節相較更是顯得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童玩節同樣地強調國際化，他們邀請世界各地各個民族，將具有特色且有趣的童玩帶到宜蘭來表演，從一九九六年辦到二〇〇二年，購票人數從十九萬人增加到八十五萬人，收入從七千多萬增加到二億四千多萬，這就是充份運用全球化所達到的效果。在這裡也顯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像這樣的國際性活動，政府部門通常不是主角，而只是扮演一個提供協助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藝術家、參展的人還有參與的觀眾，但政府的協助角色卻很重要。近年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有二個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一是從中央政府變成地方政府，第二是政府的角色逐漸地在淡化。這二個特色不只是出現在花蓮石雕藝術節或宜蘭童玩節等大型的活動中，更小眾的文

化活動亦然，如台北附近的華山。華山是一個與全球較具實驗性的藝術家往來非常頻繁的地方，而政府的角色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提供這些地方硬體跟資金的協助，那麼在創意內容上，政府的角色是微乎其微。微乎其微不僅僅是必然的趨勢，也是順應著趨勢。因為，不管是童玩節、石雕藝術節或華山文化活動，當地的藝術行政人員或是常在台灣參與的藝術家，比政府官員更清楚國際上適合交流的團體，他們有直接進入國際進行交往的能力。這種例子很多，如台北縣新莊的藝術活動，屬鄉鎮級的活動，但邀請了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的藝術家與台灣的藝術家做一些交流合作。所以全球化的現象反應在各層面上，許多小眾的藝術更因為透過全球化交流而得以生存。

掌握危機與契機

但出版業、電影製作或是唱片業的寒冬卻是全球化衝擊下的結果，所以如何去掌握這樣的危機與契機，是此刻台灣創意產業要認真去面對的課題。看起來是有機會，但若要落實實踐，則仍有許多問題亟待克服。第一個問題是缺乏流暢的資金及有遠見的企業家。以著名華人導演李安為例，在未得到奧斯卡獎座之前，曾到處拜託台灣資本家幫忙，但未獲理睬，想不到成功後，有許多資本家抱著錢要去找他。台灣的資本家並不投資文化產業，或是投資在台灣本身，相對於美國、韓國的資本家卻選擇投資本國文化產業。所以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應

當要認真來思考，尤其是政府的角色及立場。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不久前做了一項有關政府文化施政滿意度的民意調查，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數據，其中有一選項問及個人是否願意對文化活動贊助或捐獻，超過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回答，我很願意。這項回答令人驚訝，因為世界各國凡是對藝術活動較支持的國家，其文化活動之所以能夠發展，民間的力量大過於政府。政府的力量花的比較多的國家，不一定就有更好的成就，以美國與法國為例，這兩個國家相對於台灣來說都是文化的強勢大國，但相較之下，美國又比法國更有朝氣、更有活力，但在法國政府的中央預算中，文化與藝術的預算遠遠超過美國。在世界各國中央政府文化藝術占總預算的比例中，法國的文化藝術預算約占總預算百分之二左右，而美國文化藝術預算所占有的比例則不到千分之一總預算，但在文化藝術方面，美國比法國還有成就。如果政府花許多預算卻未引導民間的力量，不見得是正面的，因此美國政府支出很少的錢卻很有成果，其實與台灣是相反的途徑。像台灣稍大的博物館都是靠政府公費支出的，而在美國大部份的博物館則都是由民間捐助的，單就此點便可看出政府與民間投入輕重的比較。所以就現實面來看，台灣整體文化藝術活動的。民間支出很少，但在民意調查中，卻又有高達百分之十的比例是有支持文化藝術活動的意願。這或許是潛伏的意願，但如何將之誘發出來確實支持文化藝術活動，則是可以思考再努力的地方。

根留台灣的迷思

談到全球化帶給我們的機會和危機，個人再以其他的例子來說明。在越南有一個著名的製鞋工廠 - 寶成公司，不管是耐吉Nike或愛迪達Adidas皆委託該廠製作，為全世界第一大的製鞋代工廠。寶成在台灣發跡後，到中國壯大，後來又遷廠至印尼，但後因印尼有罷工事件，基於風險分散，故現在又加強對越南的投資，但或許因為越南的婦女善於針線刺繡，就車工縫紉而言，是很恰當的設廠地點。此案例提供台灣產業一個思考，基於擔心台灣產業空洞化及製造業外流的情況，政府部門、學術界、產業界便組成一個政府研究團至該廠訪問，希望能針對根留台灣提出解決方案，希望企業能對外投資，而根留台灣。但就現實情況而言，在整個鞋子的製作與銷售過程中，寶成公司創造了一個本身無可取代的關鍵角色，才會有美國公司耐吉與愛迪達將製鞋代工全權委託給寶成公司，因為其製作能力極強。一個產品的開發，尤其是在研發上面，第一個階段就是在設計上如何創新、如何受到顧客青睞，還有科技上更進一步的研發。第二個階段是在這些基礎後要如何進行製作，屬於製程上的研發。

個人參觀耐吉和愛迪達在寶成公司製鞋過程後認為，他們基本上很放心將業務交給寶成公司製作，在製程的研發上，從原始規格到樣式及基本的研發，到製程中間的銜接是很完整

的。而原先從研發到製程的環節需透過台灣功力高的老師傅協助，但現在此部份的功能已被中國取代，也因此不再需要依靠台灣了。以此製鞋工業來看，因鞋子以美國為主要銷售地，以美國的文化做基礎，美國人知道美國人喜歡穿什麼鞋子，這包含了物理面及文化面。就物理面而言，因體型的不同，我們無法確實認知以其身高和體格所應穿著的舒服鞋子為何，這屬於物理的根。另外，不同族群對色彩的認知是有距離的，這是文化面的差異。

舉例而言，有一位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製作寢具枕頭諸如此類的產品很精緻，但外銷市場成績不好，甚至在中國內需市場也不佳，後來改以國外高價位的精緻品銷售，但成績依然不好。後來發現，以中國的刺繡為主題是以中國人的喜好為主，或是受喜歡異國情調的歐洲人一時喜愛，但日常大量所需的是族群自己所喜愛的花色，如向日葵等或像最近在台灣流行的馬諦斯大塊大塊的色彩這類產品。該台商在改變花色後，產品果然暢銷。這就是一種物理、文化上的根。

在製鞋工業的製造過程中，從最原始的規劃到最後的產出是由美國商人主控。因此鞋子的基本根在美國，製造鞋子的根則是逐水草而居，台灣剛開始工資低廉的時候，還佔有這一項優勢，但接著那個國家工資低廉，代工廠便遷移至該地區，所以從台灣到中國，再到越南，隨著工資因素而轉移陣地。所以

講到根留台灣，以製鞋工業而言，耐吉有根，愛迪達有根，但寶成是沒有根的，既然沒有根，如何根留台灣？那麼現在寶成公司在大陸，是根留大陸嗎？雖然大陸有十幾億人口，工資上升較緩，但也不是絕對，如現在工廠在東莞，但東莞工資漸漸升高之後該如何處理？也許得要從東莞搬到西安去也不一定，所以，寶成公司在大陸也沒有根。從寶成公司的例子，我們是否要完全悲觀？其實也不盡然，理由是個人認為那就是整個東亞的經濟進一步上升時，東亞的內需市場出現，這時華人或東方人要穿什麼鞋子，不管是物理面需求或文化面需求，恐怕就非美國人可以掌握，這時寶成公司的根便會出現了。

國際標準的訂定者

再舉一個文化面向較廣的例子，有一位美術館館長提到他曾到紐約闖蕩想要打入國際但未成功，而回來香港、台灣還有立足之地。但進一步想，什麼是國際，國際的標準是由誰訂定？國際的標準其實是掌控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數位樞紐的精英所界定的，嚴格來講，國際大概就是美國紐約，所謂的國際視覺藝術，是紐約的藝術教授、藝術記者、收藏家及最基礎的愛好觀眾，總數不會超出幾千個，他們就決定了什麼是國際。這情形就像在法國鼎盛時期，「國際」就是巴黎成百上千的藝術教授、藝術家，藝術記者、畫家，還有他們的收藏家，就決定了什麼是國際。也因此，在這裡有一個很無

奈的現象，現實就是政治、經濟或文化強權的領導精英決定了什麼是國際。但是強權可以從巴黎搬到紐約，將來也有可能從紐約再搬到另一個地方。就像一開始就提到的，如倫敦，現在雖還不足以說可以取代紐約，但是就歐洲來講，柏林和巴黎都不太及倫敦，不管在商品、藝術或是在實驗藝術上，倫敦是較有前景。所以強權是會變的，那麼那位美術館館長便有機會，也許那一天當他興起的時候，也就是亞洲興起的時候。另外還有一個機會是，紐約雖然拒絕了他，但在華人世界裡以他本身的程度，至少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不會拒絕他。以該館館長擅長的水墨而言，不僅是在華人地區，是個以水墨這樣的媒介可以應用的地方，連日本、韓國與越南也肅然起敬。所以在整個東亞的漢字文化圈中，如果將之做為商品，那也是一個不算小的市場。以中國人口十幾億人、台灣及海外華人數千萬人、南北韓大約七、八千萬人再加上日本一億多人口，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人口數字。這個數字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全球大約十二億的人口來比較，那就是今天整個漢字文化圈的規模。當然我們並不敢奢望漢字文化圈、華人或東亞能取代美國，起碼在三、五十年內是較為困難，但是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應當是沒有問題。現在美國經濟較為蕭條，而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一些具強烈民族主義的人，會想像中華民族能取代美國的地位。中華民族高興於看到美國經濟的衰落，但北京的經濟官員卻相當憂心，因為經濟官員了解現況，中國經濟的成長，絕大部份是依賴美國。第一是美國提供尖端科技的基礎，由於美國

提供尖端科技的基礎，中國才有機會成為美國最大的製造工廠。第二是中國十億人口雖有一部份已經變成消費市場，如行動電話，銷售量雖與美國相等，但整個資訊產業、整個購買總值還是相距美國甚多，換句話說，中國製造完成品後，還是外銷到美國市場。第三是因共產制度，資本的累積相對的不足，發展關鍵仍需仰賴外資投注，因此資金、技術、終端的市場皆來自美國。所以，中國在製造的環節裡，若缺乏前三者條件，便也無法成為最大的製造工廠。這樣的架構中，在三、五十年內想要加以扭轉，經濟學家也很難做一保證。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也曾經有幾年經濟急速發展，且科技還曾領先過美國，甚至到今天為止俄羅斯還有相當多的科技超過美國，比如材料科學，但現在已經不復存在。另外還有日本，在日本經濟最好的時候，東京土地的總價值超過美國一個國家，但現在日本也榮景不再。因此中國是不是比日本或俄羅斯有更好的條件尚得存疑，可能有些條件是比他們好，但是也有很多條件比他們壞。第一個科技，中國的程度就離這二個國家太過遙遠，所以說中國想要完全取代美國，個人認為恐將並非如此，但是中國如果上升到一個程度，在整個華人或東亞佔有一席之地或是穩居全世界的加工製造這樣的位置，那是非常有機會的。這個機會一旦出現的時候，基本上就如前文所提，國力總體的上升，文化也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產業，接著所謂國際標準的制定者將能參與其中。就此點來看，是相當值得樂觀期待的。

文化創意的壓制

但在樂觀之餘，以華人來說，台灣大陸兩岸政策是個大問題。一方面，就中國本身來說，文化創意因專權制度受到很大的壓制。曾經到過大陸或是有在大陸投資親友的人可能知道，中國的勞工在各地方表現的都不太一樣，有一些很勤奮，也有一些是自動自發的精神不足，雖然見仁見智，但有個共同的結論是，中國的勞工靈活度不夠，而靈活度便涉及到人民受到政府相當程度控制的文化訓練薰陶所致。另一方面，一些軟體或創意產業的廠商紛紛到中國去設廠，尤其是台灣不管是以通路或者內容為主，一些跟電腦(Personal Computer)、通訊(Telecommunication)或是遊戲(Game)相關的軟體產業，都漸漸地到中國設廠。但是如果做一粗略的歸類，其實這些廠商做的是技術上的承接，而不是創意的部份，技術性或操作的部份中國勞工還可以，但創意的部份則尚有問題。以一個限制宗教自由如禁止法輪功的國家來說，創意當然也受到相當大的侷限，像二〇〇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陸作家高行健，他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但他在中國大陸過得並不愉快，他的創意恐怕只是被抹煞了。談到高行健，他所受到的壓迫不只是政治面，甚至是文化面。北京政府不但在政治面上做制約，也有一些文化面的制約，個人就認為高行健的作品「八月雪」聲勢雖浩大，但裡面有許多框框是很可惜的。

有二位作家，有類似的魅力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分別是清末民初被公認相當有才氣的中國作家沈崇文和現代的高行健，他們是非常有魅力的。對非漢人或就在漢人世界裡的人來講，他們是非常另類但具有相當魅力的人。沈崇文的小說是你不太懂得，但是會覺得是很溫馨動人且牽人肚腸，但又覺得詭異。談到詭魅的地方，這就是高行健和沈崇文不同的地方。而高行健正好補沈崇文這個面，但高行健這個面在八月雪中是被壓抑的，個人覺得非常可惜，這種壓抑使高行健真正的創造力沒有奔放出來，在劇本上有，但呈現在舞台上的表現題材，是被壓抑住的。所以要讓創意奔放，有一部份問題是來自政治解放，而另外一部份則是來自文化解放，這種另類文化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就是中國的華夷思想認為華人文化是至高無上，甚至較激烈的中華文化民族主義，認為沒有接受華夏文化，就是非人類。從歷史記錄上可以看到，古時候常常把非漢族的民族名稱加上非人的意義，如加上犬字，以英國為例，英國初抵中國時，英國人的樣子是黃頭髮藍眼睛，看到皇帝未下跪，語言更是聽不懂，所以中國以每個字都加上犬字旁的「英吉利」為其名稱。而在中國境內如有未漢化的民族，也一定會在旁邊加上犬字旁，而中國民族最複雜的地方是雲南貴州一帶，有相當多少數民族，也因此那裡的民族有叫猴族、牛族或馬族的。如西南有個民族為壯族，以前寫法為有犬字旁的「獠族」，是傳統

中國字的寫法，現在則是由中國共產黨改名為強壯的壯，這是共產主義在許多不被認同的地方下，一部份對民族的看法是較為健康正面的。而這就是中華文化民族主義對另類文化的壓制，壓制到大家都變成一樣，但這是反創意的做法。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是第一位在台灣受過完整大學教育才出國深造的諾貝爾獎得主，在著名大學裡可能已經出過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但到目前為止僅有七位華人榮獲諾貝爾獎的桂冠。這不是以智商或人數決定，而是文化的影響所產生的結果，一個扼殺異類的文化，這是要加以處理的。

還有是政治的問題，台灣中國兩岸之間，如要對抗好萊塢等強勢文化的入侵或微軟、英特爾的電腦架構，台灣跟中國需要合作。但台灣與中國要合作時，馬上會遇到一個問題，北京商人也認為需要合作，他們認為跟台灣合作，一方面固然可以對抗，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跟台灣合作最大的意義在於可以結合台灣的商人，以民逼官使政府配合，台灣要與其合作自然有所考量！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全球化的機會可以提供華人新世界的時候，卻充滿了政治性因素，本文主題以政治角度來反省是頗有正面意義的。全球化提供了台灣還有整個華人在文化創意產業上有很大的空間與機會，但也有很大的危機在前面。有一些危機是全球化所勢必會造成的，如好萊塢強勢文化的入侵等，另一部份的危機是由我們的傳統文化跟目前兩岸的政治形式所造成的，這是我們當前要去面對一個很重要的課題。